

西南交通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法国与义和团运动

---

姓名：邵兴国

---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

专业：专门史

---

指导教师：鲜于浩

---

20071001

## 摘 要

法国是近代侵华的资本主义列强之一，由于经济实力稍逊于英国，故在侵华过程中，侧重于宗教文化侵略。除与其他列强在政治、经济权益上一致外，还在侵华过程中，攫取天主教教会在华的特殊权益，而这便与中国传统封建礼教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对此以法国为首的侵略者压制中国官府，遏制中国民众，而清政府则是压内而媚外，致使民族矛盾激化，义和团运动因此而爆发。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法国一方面联合其他列强迫使清政府镇压，另一方面则怂恿列强共同出兵侵华。在法国的作用下，八国联军共同出兵侵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法国又与其他列强既勾结又斗争，以攫取最大的侵华权益，因此，法国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元凶。

**关键词：**法国 反洋教运动 义和团运动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

## Abstract

France is one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that invaded China in the modern times. because the economic potentiality is inferior to slightly England, therefore in the invasion of China process, stresses on the religion cultural aggression. The reason puts particular emphasis on in the process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in religion cultural aggression since the economic strength is slightly inferior to United Kingdom. But get rid of and seize Catholic peculiar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early a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process middle besides big powers is other consistent on politics , economic rights and interests, this has produced implacable contradiction just with Chinese tradition feudalism feudal ethics and rite , on the contrary modern religion leading to Chinese People has fought with. But to this France as the leader the aggressor inhibits the Chinese feudal official , keeps the Chinese public within limits, Qing regime is to be a pressure inner but fawn upon foreign powers , causes national contradiction to become acute, Boxer Movement broken out because of it. So on the one hand France unites other big powers to force the Qing government to suppress, on the other hand instigates the big powers to dispatch troops into battle together the invasion of China. Under France's pressure, Eight Power Expeditionary Force dispatches troops into battle together the invasion of China, after the Boxer Movement defeat, also France and both colludes with other big powers struggles, seizes the biggest invasion of China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refore said, France is the prime culprit in the War of Invading China by the 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Key words:** France; the Anti-Catholic Movement; the Boxer Movement; the War of Invading China by the 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 西南交通大学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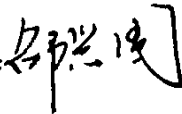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南交通大学可以将本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印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 保密□，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 不保密□，使用本授权书。

(请在以上方框内打“√”)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指导老师签名:

日期: 2007.12.24

日期:

## 西南交通大学学位论文创新性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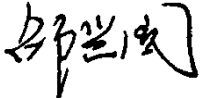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本文的创新点如下：

1. 在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法国所起的作用。
2. 法国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关系。
3. 法国与《辛丑条约》的签订。

## 声 明

本论文所引用的他人论点和相关文献，均已一一注明出处。由论文本身而引起的版权纠纷，由撰写者本人负完全责任。

签名: 

2007 年 5 月

---

## 第 1 章 绪论

### 1.1 研究动态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的反帝爱国运动，是近代西方列强侵华加剧致使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史学界对其研究也已很是成熟。建国前的不说，单从建国到 1983 年发表的论文就有 7 百多篇，截止到现在，已有千余篇，而专门论述义和团运动的资料，总计就有 1130 万字之多。并且还专门成立了义和团研究会，也经常召开学术会议，这大大推动了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对列强侵华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方面，则是集中在列强如何伺机发动侵华战争以图实现瓜分中国的阴谋，以及揭露列强联合侵华的同时，考察他们间的矛盾和斗争。典型的有董恩正的《帝国主义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的矛盾和合作》，李德征的《义和团时期帝国主义在联合侵华中的矛盾和斗争》，胡滨的《义和团运动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矛盾和斗争》，丁名楠的《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等。而涉及法国的则少而又少，仅有法国主教樊国樑的一些活动研究，著名的有邵循正的《辛庚年间天主教北京主教法国人樊国樑》，赵永生的《樊国樑在八国联军侵略时的罪行》。从总体上专门研究法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的只有葛夫平的《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此文只是阐释了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法国的外交政策及侵华状况，而对于奉行这一政策的原因则没有涉及。有鉴于此，本人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从总体上对法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作一全面的探讨和研究。

### 1.2 研究意义及方法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的反帝爱国运动，是近代西方列强侵华加剧致使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这次反抗斗争引起英法美日俄德意奥八国的联合侵华，并且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以失败而告终。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致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因此这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中有重要地位，史学研究也同样有极高的

---

史学价值。

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比较深入了，但列强侵华尤其是法国侵华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发展的研究却开展的不充分。由于西方列强的侵华加剧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而对西方列强的侵华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法国是近代侵华的重要国家，而法国对华的侵略在义和团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的研究也就同样有着重大的价值。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全力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个形势下，我们对内进行改革，对外进行开放，同心同德，竭力尽早地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此，我们尤其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为我们缔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通过对法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研究，探寻出当时的中国社会与西方交往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当今的中国社会发展也不无借鉴意义。

本文重点研究义和团运动时期法国的侵华活动以及在义和团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从而试图从总体上阐释义和团运动与法国的关系，力图有所创新。拟采用历史研究方法，即广泛地搜集史料，后对史料进行分析、归纳、综合，在导师的指导下，遵从客观历史规律，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力求避免主观，得出观点及结论。

---



## 第 2 章 法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 2.1 法国的对华侵略

#### 2.1.1 法国概况

法国是一个老牌的西方强国。14、15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后，法国工场手工业也逐步发展起来。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法国正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英国通过革命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法国则是通过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发展成为封建的中央集权的欧洲强国，同时又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也大大推动了本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封建制度毕竟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束缚也越来越严重。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掌握政权，要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于是法国爆发了 1789 年资产阶级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横扫法国的封建藩篱，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拿破仑执政时期，政府积极推行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又通过立法，从法律上来确保资本家的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18 世纪末法国也出现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更是迅猛地发展起来。由于英国 1640 年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发展更加充分，18 世纪后半期又最早进行了工业革命，实力更是雄厚。而法国在 1789 年才进行了资产阶级大革命，虽然也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落后的封建制度的长期阻滞，实力稍逊一筹。再者，法国虽然也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却保留了小地产制，加之法国政局动荡，高利贷资本发达，工业资本相对薄弱，而工业革命又是在英国的影响下进行的，故实力逊于英国。

#### 2.1.2 法国在政治经济方面对华的侵略

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对外扩张型的经济，随着这种经济的萌芽及发展，它就需要对外扩张。也正是它的推动，15、16 世纪开辟了联系东西方的新航

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积极地对外进行殖民侵略扩张。法国的资本主义推动着它也步入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的后尘，对外积极地扩张，在亚洲、非洲、美洲拥有大片的殖民地。法国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与英国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由于实力逊于英国，因此只能是屈居下风。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并积极地向外侵略扩张之时，中国正处于腐朽的封建统治末期，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列强的侵略目标。英国通过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最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英国的商品谋取到了市场。法国也不甘落后，法国政府注意到英国美国从中国攫取了大量好处，唯恐自己行动迟缓而失去这一良机。于是在 1844 年组建了拉萼尼使华团，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通过此约，法国攫取了与英国美国几乎相当的商业利益和政治权益。这非但不能满足强盗的胃口，反而更是刺激了强盗的贪欲，使其更加地变本加厉。1856 年又伙同英国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 年至 1885 年则单独发动了中法战争，到 19 世纪末期又与其他列强一道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社会。

这一系列的政治、军事侵略也使法国攫取了大量的政治、经济侵略特权，为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侵入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中法两国的产业结构的某些特点，使得双方始终不是彼此最重要的经济伙伴。而法国在华的经济力量在近代前期非但比不上英国、美国和日本，甚至比荷兰还要逊色。关于 1905 年以前的法中贸易额，从中国海关统计中不能知晓（关于 1905 年以前的法中贸易额在中国海关的统计中已无记载，不过包含在欧洲大陆诸国的项目中而已），不过根据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1892 年广东对外贸易额 1256 万海关两中，法国 41 万海关两（对华输出 4.9 万海关两，对华输入 36.1 万海关两），仅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 3.2%<sup>1</sup>。由此可以看出，法国政治军事方面的侵华并没有伴之以发展相应的经济势力，但在宗教文化方面，却充分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

### 2.1.3 法国在宗教文化方面对华的侵略

法国对中国的关注，最初与其说是由于商业资本的因素，毋宁说是由于

---

<sup>1</sup> 《法国在华经济势力之余貌》第 38 页，田永秀编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第一版

宗教的因素。法国是世界信奉天主教声名最著的国家，不仅国内信教者众，且天主教政策在其国家政策中居于至殊地位。17 世纪中叶，由于路易十四支持传教运动，该运动于 1663 年形成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前身，新崛起的法兰西民族开始掌管了天主教的传教事务，到 19 世纪成为首屈一指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支，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东传中国，非近代之事，其见于中国正史的，系起自唐太宗贞观 9 年（公元 635 年），中经蒙古入主，迨至明廷之覆，基督教曾三次东传。<sup>1</sup>在华的基督教会有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而天主教传华，肇始于 1294 年的意大利人约翰·蒙·高维诺来华布道。直至 17 世纪初年，伴随海上势力的崛起，法国才开始向中国传教。天主教有世界统一的教皇，严密的组织系统。在康熙年间因罗马教廷不尊重中国文化、习俗，反对中国人尊孔祭祖，与清廷掀起了一场关于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孰优孰劣的礼仪之争，致使雍正帝颁布了禁止外国人传教和中国人信教的“禁教令”，并下令驱逐外国传教士，中国关上了外国传教的大门。

鸦片战争的爆发和《中英南京条约》及《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给法国天主教提供了契机，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措施。而法国政府也同样注意到英国美国从中国攫取了大量好处，唯恐自己行动迟缓而失去这一良机。当无法对英国在贸易方面的霸权进行挑战时，法国就经常显示其在宗教事务方面的权威。法国的远东政策，是法国国内的资产阶级政治需要所决定的，而法国却尤为注重精神渗透，将自然的宗教利益和商业利益统一到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中来。从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眼光看来，中国应该在精神上和文化上接受法国的影响，至于天主教，既然法国皇帝和臣民都信仰，那就是你最好的宗教，你中国就该接受。正如拉尊尼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说的，“从商业贸易方面看，英国人和美国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事情可做。然而从精神、文化方面来看，我认为该轮到法国和法国政府运筹决策和采取行动了。”<sup>2</sup>于是组建了拉尊尼使华团，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通过此约，法国攫取了与英国美国几乎相当的商业利益，还迫使清政府颁布了“弛禁天主教”和“堪地还堂”的两道谕旨，标志着长达 120 多年的禁教令已被废止。

《黄埔条约》给法国天主教对华传教带来了极大的成功。法国天主教士也从禁教期间的秘密宣教转为公开传教。但条约中规定“概不准赴内地传教”又限制了其手脚。法国于是伙同英国于 1856 年找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

<sup>1</sup> 《教案与近代中国》第 256 页，冯祖贻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sup>2</sup> 《清王朝的宗教政策》第 236 页，于本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然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sup>1</sup>此约实际是规定了凡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教民即可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即使违法犯罪，中国法律也不得加于其身。同时又获得入内地传教的权利，且清政府还有保护这些传教士传教的义务。《北京条约》第六款规定，“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莹坟、天主、房廊等件应赔还，交给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sup>2</sup>而此条款“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规定，文本中没有，是当时担任翻译的传教士擅自在法文文本中增加的。有史家曾就此事评论，“传播上帝福音的教士，居然可以用欺骗诈术于如此重大的事项，即使其目的纯为良善，其手段仍深为可鄙。”<sup>3</sup>至此，法国借炮火和战争的威力及传教士的诈骗手段，为其宗教侵略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法国一方面攫取传教权利，另一方面又图谋垄断对中国教务事务的管理权，即倚重教廷，积极抢夺所谓的“保教”权。所谓“保教”，指保教国有权给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的非保教国籍的天主教传教士签发保教国护照，当其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与官员及平民发生纠纷时，保教国将积极对他们采取所谓的保护。罗马教廷为了调适各殖民主义者的天主教修会在殖民地国对传教利益的争夺和内讧，曾于 16 世纪授于葡萄牙以“保教权”。据黄埔条约，法国首先获得了在通商口岸建设教堂、学校和医院的权利，接着其它列强也获得了宗教传教的自由。根据“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关于天主教的传教方面法国所获得的权利，并不是仅仅针对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及其信徒的，而是涵盖所有天主教传教士及信徒的。因此天主教的这个所谓的“保教权”，势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天主教传华一事上，法国一直行动积极。法国认为它对在华的所有天主教传教士有保护之责，拿破仑皇帝曾于 1802 年致信巴黎总主教和罗马教皇，希望将“东方所有教友尽量置于法国特殊保护之下”。1844 年起又积极争取它作为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华保护国的地位。1846 年罗马教廷将北京主教区交给法国管理。教廷的态度，立即引起在华的各国天主教修会的

<sup>1</sup>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107 页，王铁崖编，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sup>2</sup> 同上注第 147 页

<sup>3</sup> 转引自《晚清时期法国天主教对华传教政策评述》，刘正祥著，《中国天主教》2003 年第 3 期

反应，加之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所获得的宗教方面的侵略权益是由法国公使和总理衙门以交换协诺的形式而取得的，这是条约外的协诺利益，其它各国不得均沾。尤其是在当时，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在华有公使馆的唯一国家，因此，天主教传教士或为在中国传教建设新的教堂而购买土地，或为领取去中国内地旅行的特别旅行券，不论是哪国的，必须得到法国公使的许可<sup>1</sup>，所以纷纷表示惟法国的马首是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被迫承认了法国作为外国传教士保护国的地位，罗马教廷对此表示欢迎，并要求所有来华传教士寻求法国的保护<sup>2</sup>，后“教皇以保护远东天主教传教事业之责，专托法国”<sup>3</sup>。虽然欧洲其它天主教国家也希望本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从法国的保护下解放出来，但各国的传教士数量少，且本国的对华势力又远远不及法国，即使强行从法国的保护下解放出来，其利益也得不到承认。相反，将其置于法国的保护下却更是有利，因此，关于天主教的传教保教权就一直为法国所独占。直到 19 世纪末，德国一方面在其对华政策中利用传教士，另一方面又想限制法国的势力，夺取了其在华的保教权，而到 1905 年，颁布分离令后，法国在华的天主教保教权才结束。

法国在近代前期在中国就具有这样一种宗教上的特殊地位，它谋取到保教权后，其在华的天主教势力达到了巅峰，而法国也借此特权，积极地扩大其在华的侵略势力，而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也就与法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2.2 法国的宗教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 2.2.1 法国天主教在华的罪恶活动

虽然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sup>4</sup>，列宁也曾说“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sup>5</sup>而中国外来的宗教并不只有天主教，还有佛教、伊斯兰教等，况且中华民族是个兼收并蓄的民族，为何对天主教反应如此强烈？这与天主教的自身不无关系。

---

<sup>1</sup> 《法国在华经济势力之全貌》第 154 页，川永秀编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第一版

<sup>2</sup> 《近代中国教案新探》第 156 页，吴金钟等编，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sup>3</sup> 《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第 289 页，李育民著，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sup>5</sup> 《列宁全集》第十卷 62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及伦理道德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天主教崇奉唯一的真神上帝耶稣基督和圣母及其圣徒之外,对其他任何来源的精神信仰均予以摒弃和排斥。并且还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普世皆为兄弟姐妹。按其思想,君臣父子、兄弟姐妹凡奉教者皆为上帝的赤子,无任何阶级、尊卑、性别和贵贱之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以“三纲五常”为典型特征的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还有在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传统的风俗习惯和掺杂着佛、道、巫等宗教的多种崇拜,这些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在中国,还有祀祖尊孔,迎神赛会,求神祈雨及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礼俗,而这些礼俗,又以祖先崇拜为伦理基础,这是封建宗法社会的核心。这些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及伦理道德一方面是官绅阶级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还是最底层百姓的文化心理。所谓官绅阶级,是政治和学术上拥有功名或资历,在经济上与封建土地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在礼仪、司法、税役上享有一定的特权,拥有一方社会领袖威望的官吏、士大夫、地主及退休官僚,实际上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国的最底层百姓都懂得孝顺父母、尊顺君师,而天主教的教义不仅最底层的百姓都不理解,更不用说官绅阶级这些封建的“卫道士”们了。

自明末以来,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尊重的态度,典型的教士有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他们大大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但也有相当一批教士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敌,将儒学置于基督教的非此即彼、此毁彼兴的对立面,与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的“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sup>1</sup>。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康熙年间所谓的“礼仪之争”。

特别是近代,教会势力的发展是作为一股政治势力,伴随着外国侵略者的枪炮而发展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sup>2</sup>,列宁也曾说,“传教士是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sup>3</sup>楼宇烈也指出,“一切传教士都从鸦片战争和随着中国的失败而签订的诸条约和法令中获得利益和好处”,还说“谁能敲开中国的大门,谁就可获巨大的财富。于是就有鸦片加大炮,不平等条约,以及随之而来的刺刀尖上的《圣经》。”<sup>4</sup>连法国也

<sup>1</sup>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599 页, (美) 费正清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第 50 页, 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sup>3</sup> 《列宁选集》第一卷 214 页,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sup>4</sup> 《中外宗教交流史》第 411 页, 楼宇烈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有人认为“天主教是法国推行侵华政策的最好工具，而教会则依靠法国政府的强权政治，扩大在华的传教事业”，<sup>1</sup>法国外交官驻华大使施阿兰也认为：“自从1844年以来，保护天主教会和传播我们的文化，一直是我们干预中国和经略印度支那的主要动机”。<sup>2</sup>美国学者周锡瑞也指出，“当事实证明传教士和商人一样，没有进一步成功地把中国租界变成其出售精神产品的市场时，他们转而支持西方利用枪炮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sup>3</sup>。传教士以特殊的身份闯入中国，一方面是宗教团体的宣教师，另一方面又是战胜中国的外国侨民，享有特殊的权利。根据一系列特权，外国传教士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且还得到外国领事的保护。传教士的寓所和教堂，中国无权管辖，中国犯人逃到那里，中国政府不能去搜捕，而清政府还要负责保护教士和教堂。“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当处分。”更有甚者，1896年5月清政府颁布的教案处分办法，凡教堂被毁，“将该地方官照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例议处”，“其保护未能得力，自属办理不善，应查照历办成案，以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例定义”。从以上各项规定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地方官为什么“畏教如虎”同时又“视之如仇了”。外国传教士除了具有上述种种特权以外，在政治地位上，官方更有明确的规定。1896年3月28日，总署颁布了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五条，这个条例，天主教、耶稣教一律通用。其主要内容有三方面：“第一，总主教或主教，品位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与司道同级。司铎与府厅州县同级。第二，分别教中品秩与同级中国官吏相来往。第三，教案发生时，主教司铎转请护教国公使或领事官，同总署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以直接向地方官商办。”有人这样形容传教士，“右手拿着宝剑，左手拿着十字架，而在他们的道袍里面却藏着武士的全副盔甲”。<sup>4</sup>

正因他们拥有这些特权，所以在中国为所欲为。一方面他们霸占田产，清政府命令发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由于年深日久，原来的天主堂早已改建为民房，又经几代变迁，增建房舍，而只付给原来的契纸的银价。教会又利用有权在内地置产一项，采用强租强占、盗买盗卖的手法夺取土地。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天主教会的几千座教堂和众多的学校、医院及各类慈善机关，星罗棋布点缀在全国各地。“教会根据不平等条约体制的规定，在许多省

<sup>1</sup> 《江南传教史》卷一 第173页，(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与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sup>2</sup> 《使华记》第195页，(法)施阿兰著，袁传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sup>3</sup>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81页，(英)周锡瑞著，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sup>4</sup>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第341页，王继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份拥有大量的土地。”<sup>1</sup>另一方面又利用政治和外交特权干预地方词讼，“遇有交涉之案，但凭教士一诉或一言，即签票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复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甚至“教士、教民与地方官并座公案。”<sup>2</sup>再有是吸收信徒，往往也借助不法手段。“天主堂为了扩张势力，勾引人入教，愿来者一律给三块银元，因而多有不法之徒投身教堂。”<sup>3</sup>有相当数量的市井无赖，流氓恶棍，混入了教会当中，这些人不是真的信教，而是想利用进行教民的特权为其为非作歹的行为提供保护，还有一些地主恶霸也乘机投靠洋人，这些人“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摇，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sup>4</sup>。随着教会在华势力的不断恶性膨胀，更多的恶霸无赖也籍着入教为名来逃避官府的管辖，以教会的特权为掩护为非作歹。还有侮辱霸占妇女，坏人婚姻家庭。虽然反教舆论中对传教士桃色方面的指斥大大夸张了，但教士中也确有胡作非为的流氓之辈，利用种种手段，侮辱妇女，教唆淫乱。至于干涉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婚姻，破坏他人家庭之类的事情，那就更是屡见不鲜了。这类事情决不仅仅是道德价值观念和习俗方面的问题，而是对人身基本权利的侵犯。这样的传教活动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内地人民的强烈不满与抵制，它所能带来的也不再是文明与福音，而只有仇恨。正如列宁所说，“那些到中国只是为了贩卖毒害人民鸦片权的人，那些伪善地以传布基督教来掩护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能不憎恨他们吗。”<sup>5</sup>

### 2.2.2 清政府的妥协政策

针对外国传教士的肆虐，中国官吏却又畏之如虎，民教发生冲突时，往往是压抑民众。这样一方面纵容助长了教士及教徒的嚣张气焰，使其更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正如法国学者卫青心说的“中国教徒是孤立的教徒，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西方精神移民。他们形成了宗教和非宗教性质的团体，并窃取了一种会引起严重后果的独立，从而逐渐摆脱了地方官的束缚。……中国教徒因为头脑中存在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思想倾向，所以昨天还是受压者的教徒，今天地位变了，就想欺压别人，或者觉得自己在享受信仰权利方面

<sup>1</sup>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84页，顾卫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sup>2</sup>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第60页，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sup>3</sup> 《京津蒙难记》第7页，北京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sup>4</sup>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8—49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

<sup>5</sup>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



可以间接地依靠法国,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sup>1</sup>另一方面又压制民众,致使民冤不申,导致人民群众的不满,而反抗斗争自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这在北京义和团告白中也有反映,“兹因天主教并耶稣教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群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sup>2</sup>对此,清统治者也有了清醒的认识,李鸿章曾说“其侮吾学也,不足虑;其挠吾政也,深可忧。其侵吾教也,不足惧,其诱坏吾民也,则深可危”。<sup>3</sup>1900年的泰安府稟中这样说,“去岁拳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sup>4</sup>当时山东流传的一句民谚也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什么天主教,称天父天兄,绝天伦,灭天理,光天化日,闹得天昏,赶多咱天讨天诛,天才有眼!这些地方官,似地贼地寇,掘地宝,剗地藏,胜地名区,变成地狱,又搭上地租地税,地也无皮。”<sup>5</sup>

以上的这些所作所为,并不都是法国教会的勾当,但是由于法国拥有保教权,每当发生冲突时,法国政府总是站在前面,为教会“排忧解难”,并且“唯恐天下不乱”,尽最大可能的攫取最大的侵略权益。因此,中国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和法国教会及法国的侵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传教士是抱着虔诚的宗教信仰来华传播上帝的福音的,但在近代中国,列强侵华的这个大环境下,他们的分量是微乎其微的,并不能改变整个教会侵略的性质,因此,也只能是导致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当然,他们的积极作用我们也不能一笔抹杀,限于与本文的关系,我不做深入论述。

### 2.2.3 中国反洋教斗争及评价

近代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61年贵州开始驱逐外国传教士到1870年天津教案。这期间,各国传教士相继在沿海、沿江建立教堂,招收信徒,无视中国的传统礼教和风俗习惯,激起了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不满。他们打出了“排斥异端”和“保卫圣道”的旗号,号召和组织官役、兵丁、团勇等起来进行斗争。1870年,更是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数千名群众抗议法国教堂迷拐幼孩等罪行,激起双方冲突,

<sup>1</sup>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第 706 页, (法) 卫膏心著, 黄庆华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sup>2</sup>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 21 页, 陈振江, 程敬注,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sup>3</sup> 《李鸿章全集》(三) 第 413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sup>4</sup> 《山东义和团案卷》第 484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 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sup>5</sup> 《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第 14 页, 骆永烈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发生流血事件。第二阶段，从天津教案后到中法战争结束。地处抗法前线的云南、广西、广东和台湾、福建、浙江等省人民，群起焚教堂，驱教士，自发地把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与保卫边疆的斗争结合起来，造成很大声势。第三阶段，从中法战争后到1894年中日战争前。由于各国传教士公开与中国的媚外官吏勾结起来，包揽词讼，干涉内政，插手外交，加剧了我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各地群众反教会斗争继续发展，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第四阶段，从甲午战后到义和团运动。从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反教会斗争一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而且进一步激起了爱国热情，终于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威震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也是多年来遍及全国反对外国侵略者利用宗教侵华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教案。”<sup>1</sup>

近代中国的这场反洋教斗争，是因为法国及其它西方传教士借侵略者的枪炮侵入中国而发展起来的。传教士本身就是侵略者的一部分，他们借助种种特权，肆意破坏中国主权，在中国强占地产，包揽词讼，庇护地痞流氓，给中国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这场斗争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反映出中国人民顽强反抗外侮的不屈精神和斗争意志，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毋庸讳言，这场斗争也反映出中国民众的愚昧、落后和盲目排外的倾向。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严重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的落后的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也阻滞了社会的进步。而西方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西方传教士也不全是侵略者，也有部分教徒是虔诚的信徒。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把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到中国。而中国民众的反洋教斗争，是在封建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而进行的，斗争过程中，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反对，因此带有愚昧落后及盲目的排外性。虽然，中国的反洋教斗争有落后性，但从当时的客观实际看，我们不能苛责当时的民众，他们不可能会有先进的思想来指导。相反，他们所体现的顽强不屈的反抗外侮的斗争意志和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人，永远闪耀着光芒。

---

<sup>1</sup>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195 页，顾长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2.3 法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2.3.1 义和团运动兴起前的形势

19世纪末期，法国及其它列强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过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促使法国及其它列强加紧向外侵略扩张。这时，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只剩下中国这块“肥肉”，因此法国及其它列强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们在中国抢占租借地，抢划势力范围，同时，在经济方面也加紧资本输出，抢掠中国的矿产资源，争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中华民族到了“瓜分豆剖”的生死存亡之秋。

在国内，甲午战败，清帝国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五千万两。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仅有八千万两，但在支出方面，只军饷、洋务、债息就要耗费七千多万两，在加上国用常经、京饷、旗兵饷需及内务府经费约二千万两。<sup>1</sup>入不敷出，只能举借外债，而法国及其它列强则又借此攫取了大量的政治权益。清政府只能加重勒索、剥削以维持生存，统治更是腐败。自鸦片战争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随着法国及其它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殖民地沉沦。随着价廉物美的外国商品的涌入，正如一资料中描述的，“中国自通商以来，洋货日销，土货日绌。洋纱洋布，岁销五千三百万。其余钟表、机器、呢绒、毡毯、火油、食物，以至纽扣针线之细，皆窥我情形，操我玩物，务夺我小工小贩一手一足之业者。而乃销流日广，始于商埠，蔓于内地，流于边鄙。”<sup>2</sup>中国的家庭手工产品无法与价廉物美的洋货竞争，遂逐步破产，这样，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也逐步解体。沿袭了数百年的生活方式遭到严重破坏，千百万艰苦度日的农民赖以谋生的手段被洋货所摧毁，农民陷入了比以前更加贫困饥饿的深渊。

19世纪的山东，天主教、耶稣教所建的大小教堂，遍布全省。法国由于拥有保教权，无论哪个国家的传教士来到中国，都要受法国的保护。而以德国为首所“圣言会”力欲冲破法国的控制，这实际也是法国和德国争夺中国权益而斗争的一个侧面。法德两国为避免宗教干预他们的内政，在国内都竭力限制天主教的活动，但在中国却积极地争夺保教权。后来，法国作出让步，把兖州府、沂州府、曹州府和济宁州划归圣言会。这样，山东天主教会分为

<sup>1</sup> 《从田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第3页，骆永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sup>2</sup> 转引《19世纪后半期几种洋货和土货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右朴，《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

三个教区，南境教区包括兖州府、沂州府、曹州府和济宁州，几乎占了半个省份，由圣言会负责，总堂在兖州，1885年教皇派安治泰主教分理教务。东境包括登州府、青州府和莱州府，北境包括泰安府、济南府、东昌府、武定府和临清州，由法国操控的方济各会负责。<sup>1</sup>在教会的肆虐下，本就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起来，终于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 2.3.2 法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发展

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山东，源于山东的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省威县）一带。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就是义和拳、大刀会、梅花拳等民间团体的活动之处，而这一地区又处于直、鲁、豫和苏的四省边界，清政府统治力量薄弱，1894至1899的六年间，巡抚四换，政局极为不稳，再加上内外战祸，水旱天灾，人民颠沛流离，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反洋教斗争终于演变成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而长期胶着的梨园屯教案则是导致义和团运动在这一地区首先爆发的直接诱因。

梨园屯教案的直接起因是民教互争庙地而引起的，从1873年到1897年延续闹了20多年，屡结屡翻。这充分说明洋教与中国封建礼俗矛盾冲突的剧烈，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及其它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恃强相压。在民教互争庙地的几次反复中，地方官的处理虽不能说都是“秉公而断”，但他们多数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加以处理的。可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却常常推翻意见，他们通过法国公使不断向总理衙门施压，而地方官顶不住这种压力，只能是压制民众，使事态更是激化。如1897年（光绪23年）3月的这次冲突，经东昌府知府洪用舟前往查办，以庙基为始祸根由，断令将庙基充公，归官经理，作为义学，另为洋人觅地建堂，同时缉拿凶犯，并赔偿教民损失。嗣因该县觅地为就，久未议结。而法国公使几次照会总理衙门<sup>2</sup>，施加压力，催办此事。到冬季，主教马天恩又“顿翻前说”，勒索多款。山东巡抚张汝梅又复派东昌府知府洪用舟驰往查办，并派勇队协同查拿，同时将知县撤任，换了新县令，飭令妥速办理。但法国公使却根据主教马天恩的意见，照会总理衙门“非只梨园屯教案尚未办竣，惟恫喝教堂危险及教民受累，地方官毫无阻止。……特请电飭山东地方官：一、将犯罪之首18名，均系官员知悉者，限3日内全行拿

<sup>1</sup> 《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第8页，骆永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sup>2</sup>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56、5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一版

获。或该犯逃走，须将家口扣留，产业入官。二、山东透北教堂受累，应赔偿银二万两。三、山东东昌府洪时常与教士为难，并阻止办理，理应撤任。四、现任吉道应换前办教堂之张道。”<sup>1</sup>由此可知，地方官以后会如何办了。对此，清统治者也有认识，山东巡抚毓贤在奏折中说，“……而民教之所以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响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俞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一但有事，则教士以毁坏什物，焚毁教堂，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辞以告各国公使，而公使遂以诘责总署，百端要挟，异议横生……”。<sup>2</sup>这样，矛盾越来越激化，到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以阎书勤为首，联合直隶威县赵三多等，聚众烧毁红桃园教堂，占领犁园屯，震动了鲁、直两省的毗连地区，成为义和拳反帝斗争兴起的讯号。

由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当时东昌府知府洪用舟的处理应是可行的，但终因传教士及教民的反对而不得实行。而法国公使则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地听信教士，为其撑腰，要挟总理衙门，提出非分的要求。而总理衙门只有压制地方，地方也只能是压制民众，尽量满足教士的贪欲。这不能不使民怨不申，群情激愤，而民众只能是铤而走险，唯有起来反抗一途了。

犁园屯的反抗斗争揭开了义和拳运动的序幕，在其影响下，山东其他各地也纷纷响应。山东巡抚张汝梅意识到形势不可逆转，于是建议清政府改义和拳为团练，以便控制，并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后，企图瓦解分化义和拳，采取“分别良莠”的办法，对参加义和拳的一般群众称为良民，默许他们设厂练拳，对武装反抗的人则诬蔑为“匪徒”，捉拿惩办。张汝梅、毓贤的计划虽未达到预期目的，却有利于义和团的发展。山东各地大刀会、红拳会以及其他秘密结社的成员和一般群众纷纷参加义和团，使其迅速发展起来。山东义和团的发展使法国及其它传教士很是恐慌，他们要求清政府严加镇压，同时也要求法国公使维护其利益。而与其一丘之貉的法国公使则致函总署，称“因教案，大刀会匪人欲将教士及教民图害，危险甚重。地方官并不保护。本大臣相应函请贵王大臣即速飭知该省大吏，严飭所属加意保护，弹压平静为要。”<sup>3</sup>以后又数次致函总署，要求镇压民众的反抗，保护

<sup>1</sup>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 114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 1990 年 8 月第一版

<sup>2</sup>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6 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 1964 年第一版

<sup>3</sup> 同注 1 第 403 页

教会的权益。<sup>1</sup>法国公使感觉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使清政府听从，于是联合其它列强共同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严剿义和团，并保护教士，撤换山东巡抚。清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改任对列强示好的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而袁一到济南，立即颁发《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和《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又严令各州县募雇壮勇，举办团练，协同防剿义和团。袁世凯在镇压义和团的同时，竭力保护教士，其宗旨是“凡系匪徒必须剿捕，凡系教堂必须保护”。<sup>2</sup>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下，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被迫转入低潮。清政府在“剿”与“抚”之间的徘徊，导致义和团在山东受挫，后将反教斗争转至直隶地区，推动义和团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纵观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的必然，由于法国及其它列强的侵略使中国的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加之清政府又腐败无能，所以掀起了义和团运动。虽然，法国对华的侵略仅是列强侵华的一部分，其政治经济的侵略又不是主要的，但是，法国却推行独特的宗教文化侵略政策，正是其宗教文化的侵略，使其成为中国反洋教斗争的主要矛头。而义和团运动又是从反洋教斗争发展而来的，法国及其支持下的教会势力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由此可知，法国及其支持下的教会势力可说是义和团运动兴起及发展的重要的“催化剂”，它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

<sup>1</sup>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434、435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一版

<sup>2</sup>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32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一版

---

## 第3章 法国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 3.1 联军侵华前法国的活动

#### 3.1.1 法国联合其他列强威逼清政府剿杀义和团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发展，而义和团又公开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攻打教堂，杀死教士，斗争矛头直指拥有“保教”权的法国。在这种形势下，法国一方面自己胁迫清政府剿杀义和团。在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之时法国及其教会势力就做过多次了，这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有较多的史实足以证明。在1900年1月27日，法国公使毕盛又致函总署，施加压力，要求镇压山东境内的义和团。‘法国教会也不甘寂寞，配合政府，积极的行动，法国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樑的书简中又说“我向所有的高级官吏都写了大量书信，在我的要求下，中国当局已经向许多基督教机构排出了一些军队”<sup>2</sup>。1900年5月末，他还写信给荣禄说“……而乞阁下遇便代为奏明皇太后，设法救教民于水火中也”<sup>3</sup>，还说“若不作速想法严办”，列强将“护教弥乱”<sup>4</sup>。以上史实充分说明法国及其教会势力对义和团运动的恐慌，也充分说明了他们欲谋把义和团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下的狼子野心。

另一方面，法国还联合其他列强一起威逼清政府剿杀义和团。法国公使感觉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使清政府听从，于是联合其它列强共同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严剿义和团。俄驻北京公使说，“我的法国同僚对此类消息很是惊惶，请求我和他合作促使中国政府有力地压制义和拳，因为他们已经威胁着住在北京的一切的外国人。”<sup>5</sup>法国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樑也说，“我正式致函法国公使，他立即约见中国外交机构的代表。大家一致决定要求中国政府迅速弹

<sup>1</sup> 《教务教案档》第6辑（一）第42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版

<sup>2</sup> 《清末教案》（第四卷）第559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一版

<sup>3</sup> 《荣禄存札》第386页，杜春和等编，齐鲁书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sup>4</sup> 《信稿录存》，《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26、20页

<sup>5</sup>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4页，张荣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4月第一版

压, 否则将会面临欧洲军队登陆进行惩罚的危险。”<sup>1</sup>1900年初, 针对义和团运动加剧和清政府态度暧昧的现实, 法国驻华公使毕盛最先倡议英、美、德同僚召开四国公使会议, 协商共同采取行动迫使清政府拿出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办法。在毕盛的倡议下, 1月27日四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同文照会, 要求清政府颁布一道上谕, “宣布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结社”<sup>2</sup>。后法国代表多次单独或与其他列强公使一道对总理衙门施加压力, 催促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取缔义和团。1900年4月, 又伙同英、美、德四国公使联合发出照会, 限令清政府在“两月以内, 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 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 代为剿平”<sup>3</sup>。法国还积极支持英国公使窦纳乐提出的向清政府进行海军示威的建议。当英国驻法大使芒逊就海军示威一事询问法国政府的态度时, 法国外长德尔卡赛明确表示不会拒绝。但后驻英大使报告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告知他示威是危险的步骤, 并说英国宁愿先让时局发展。另外法国驻华代办唐端又向德尔卡赛表示, 他附和这一威胁, 为的是不使自己与其他公使的行动脱离。他本人的意见是, 筹划一次海军行动尚未成熟, 于是作罢。<sup>4</sup>后毕盛报告英、美、德已决定派军舰示威的消息, 法国外长又马上作出反应, 他一面致电法国驻华盛顿、伦敦和柏林大使, 要求他们确切告知他各驻在国政府的态度, 一面致函海军部长拉那桑, 向他通报中国局势, 并要求海军部长给法国驻远东舰队司令柯莱耀尔下达训令, 让他在必要时将所有军舰交由驻华公使支配。<sup>5</sup>这些充分反映了法国对义和团运动欲处之而后快的心态, 也反映出义和团运动对其利益的威胁是多么的深重。

### 3.1.2 法国联合其他列强共同出兵侵华

义和团运动兴起及发展的过程中, 法国采取种种措施胁迫清政府剿杀义和团。但形势的发展出乎法国的预料, 剿杀义和团的意图落空。法国教会为保护自己的利益, 积极地怂恿本国政府出兵侵华。1900年5月19日, 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樑致函毕盛, 称“局势已变得日益严重和危险……我请求您相信, 公使先生, 我是很了解情况的, 而且不是随便胡说。宗教迫害只不过是掩盖

<sup>1</sup> 《清末教案》(第四卷)第559页,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一版

<sup>2</sup>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4页, 胡滨译, 中华书局1980年5月第一版

<sup>3</sup> 《近代中国史稿》第606页, 《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 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sup>4</sup> 《近代中法关系史稿》第177页, 鲜于浩、田永秀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sup>5</sup> 转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 葛夫平, 《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饰，其主要目的是要消灭欧洲人……我认为我有责任要求您给我们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前来北堂，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sup>1</sup>。为了维护法国在华的侵略权益，法国在列强中最先赋予驻华公使自由处理权，“以便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证我们在中国北方的侨民的安全”<sup>2</sup>。法国政府决定出兵侵华，用武力迫使中国屈服，来保护他的侵略权益，但也知道，单靠法国一国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联合其它列强。于是，授意驻华公使及其他驻外使节，竭力促成列强联合。

这样，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秉承法国政府的意旨，极力促成列强联合武装侵华。5月17日，毕盛找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危言耸听地夸大形势，寻求英国公使支持法国，联合出兵保护他们的侵略权益。“法国公使今天前来告诉我：在保定附近……义和团破坏了三个村庄，并杀死61名罗马天主教徒。法国主教通知他，在那个地区及天津和北京周围的地区，到处是一片混乱。”<sup>3</sup>法国公使又积极倡议，要求召开驻京的外国使节会议，以便商讨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5月20日，“在法国公使的请求下，所有十一国使节参加了举行的外交团会议”<sup>4</sup>，在会上，毕盛提交了法国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樑致他的信函，并吁请各国公使高度重视樊国樑对形势所作的估计和判断，声称“对前途的危险无论怎样估计也不过分”<sup>5</sup>，并且最先正式建议列强共同调兵来京，保护使馆和教堂。当此建议因英国公使的坚决反对而未被会议接受时，他又在会上提议向清政府提交一份联合照会，并拟定了措词严厉的文稿，要求清政府切实镇压义和团。照会提出：“一、凡参与拳会操练，或在街头制造骚乱，或继续张贴或散发威胁外国人之揭贴者，均予逮捕。二、义和拳集会之庙宇或场所的所有人和监护人，均予逮捕；凡与义和拳共同策划犯罪活动者，均作义和拳论处。三、凡负有责任采取措施之官员，犯有玩忽职守或纵容暴徒之罪行者，均予惩罚。四、凡企图杀人放火、谋财害命之首恶，均予处决。五、凡在目前骚乱中帮助及指点义和拳者，均予处决。六、在北京、直隶及北方其他各省公布这些措施，以便人人知晓。”<sup>6</sup>在5月26日的公使团会议上，毕盛又抢先发言，危言耸听地断言在北京将发生一场危及所有欧洲人的严重暴动，再次呼吁共同调兵保护使馆，以防止发生暴动的可能。“如果中

<sup>1</sup>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 72、73 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1980 年 5 月第一版

<sup>2</sup> 《八国联军侵华史》第 25 页，李德征等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sup>3</sup>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 16 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1980 年 5 月第一版

<sup>4</sup>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 18 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1980 年 5 月第一版

<sup>5</sup>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 71 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1980 年 5 月第一版

<sup>6</sup>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 74 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1980 年 5 月第一版

国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动，各国使节应马上调来卫队”<sup>1</sup>。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在其他各国作出决定之前，法国公使就已经调来了他的卫队，后在5月28日的公使团会议上，“各国一致决定调来卫队保护各国使馆”<sup>2</sup>，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5月31日，3名法国军官和2名法国士兵随第一批“使馆卫队”进入北京。对于毕盛和公使团会议作出的派兵进军北京的决定，法国在收到毕盛的电报后，即予支持。6月5日，法国外长德尔卡赛致电毕盛，对他的决定予以肯定，“表示政府绝对信任”。并告诉他，政府已决定命令远东舰队司令马上率领全部舰只在大沽重新集合，供他调遣。在训令中德尔卡赛还指示遇事除与俄国公使密切配合外，还应尽力与其他国家的同僚保持一致，强调“在目前的情况下，列强之间的团结一致，也是对各国利益的最好保证”，“只有列强的一致行动，才足以威吓中国政府，使之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镇压暴乱”<sup>3</sup>。为此，德尔卡赛还致电法国驻维也纳、圣彼得堡、伦敦和意大利的大使，要求他们向驻在国政府转达法国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希望与各国一致行动的愿望。在此后的日子里，法国一直都将列强的联合行动作为它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对华政策的出发点。也正是在法国的极力促使下，列强才联合挑起了侵华战争。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达2000余人。6月6日前后，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

由以上史实，我们也可看出，针对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法国力主剿杀，先是迫使清政府，后看到清政府无作为，又感到自己势单力薄，于是怂恿其它列强共同出兵，也正是法国及法国的外交努力下，才导致了八国联军共同侵华。

<sup>1</sup>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 20 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1980 年 5 月第一版

<sup>2</sup> 同上注第 21 页

<sup>3</sup> 转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葛大平，《近代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 3.2 联军侵华战争中法国的活动

### 3.2.1 法国政府的外交活动

在1900年6—8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军事行动中，法国虽然派兵参加了联军的每一次军事行动，但它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远不及日、俄、英、美、德等国，相对而言，法国在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比较突出。在各列强之间，法国极力协调各方立场，不时为侵华行动献计献策，充当军师角色。

1900年6月9日，英国公使窦纳乐获悉义和团已逼近北京郊区，感到形势紧张，于是急电天津领事贾礼士，要他立即通知海军中将西摩尔，迅速遣援军直趋北京。这批侵略军在途中遭到了中国军民的截击，经过两个星期的苦战后才狼狈地逃回天津。这次侵略行动一开始，西摩尔率领的侵略军只有六七百人，后来俄法军队才陆续赶到，也只有两千余人。这次侵略行动的失败，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夫认为，“进军失败的原因属于军事障碍的少，而属于司令官间政治性的意见为多。日英及俄法两集团间存在着激烈的仇恨与怀疑，使列强间的团结能够继续到纠纷结局为止，是极不可能的”。<sup>1</sup>对此，法国政府也有清醒的认识，7月初，在得知西摩尔联军进犯北京失败的消息后，法国政府即向列强发出加强联合行动的呼吁。7月2日，法国外长德尔卡赛致电法国驻俄、英、德、奥、美、意等国大使，要求他们尽快转告各驻在国政府，法国希望各国能在共同协商后，给它们在直隶的军队指挥官发出同样的训令，征询进军北京所必需的军队总数，以便各国军队在统一指挥下协调行动。德尔卡赛在电文中强调指出，“鉴于西摩联军进军北京失败的教训，当务之急是在华的各国军队应在统一指挥下行动，尽力避免单独行动，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解救被围困在北京的外国人这一目的”<sup>2</sup>。对于法国的这一建议，各国反应不一。俄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德国表示赞成。美国一方面表示愿意与其他列强一起打开通向北京的道路，但同时又表示，为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愿维持与中国的和平，通过现有条约所赋予的手段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英国则不同意就进军北京所必需的军队人数问题在各国驻大沽舰队司令会议上协商决定，而更愿意由各国征询本国指挥官的意见，认为大沽舰队司令会议所作出的联军人数的建议“可能代表多数能力较弱的人的意见，

<sup>1</sup>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4、15页，孙瑞芹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8月第一版

<sup>2</sup> 转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葛大平，《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而不代表其中能力最强的那些成员的意见”<sup>1</sup>。总之，英国不愿在军队人数问题上受它认为的“较弱”国家的牵制。而法国政府为了保护被围困在北京的外国人的安全，又于7月4日致函各国政府，建议在联军到达北京之前，由各国联合向中国政府发一份照会，声明列强一致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对各国公使及侨民的生命安全负责。法国的这一建议得到英、德、意、奥等国的积极响应。

更为恶毒的是，为从根本上削弱清政府的抵抗力量，法国又在7月中旬最先建议欧美各国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7月17日，法国外长德尔卡赛在致法国驻外使节的通电中指出：“根据我所得到的情报，欧洲某些港口仍在继续将枪支运往中国。对于中国不能再从它们国家那里得到武器这一问题，所有列强都有共同的利益，中国已得到太多的武器，况且这些武器又是用来对付列强的。因此，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府会拒绝对北京采取必要的谨慎措施，我请你们告诉（驻在国的）外交大臣，共和国政府决定就此与列强进行磋商”<sup>2</sup>。法国的这一动议，立即得到各国的响应，且超出正在侵华的八国之外。当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表示，他与法国外长同样关心这一问题，并准备将它提交内阁会议，以便通过一项法律，停止英中之间的军火贸易。次日，比利时、奥匈帝国和荷兰分别作出反应。比利时外长的答复是，虽然比利时政府原则上给军火贸易以很大的自由，但在目前的情况下，鉴于文明国家的共同利益，从现在起它将考虑采取预防措施。奥匈帝国则表示将参与列强可能采取的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的一切措施。荷兰政府的答复是，荷兰并没有武器制造商，但是他们不知道外国军火商是否使用荷兰港口运输武器，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他们将阻止武器运往中国。1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表示，美国法律并不允许总统禁止某一种贸易，但联邦政府与法国政府一样，承认有采取谨慎态度的必要性，因此决定在合众国港口尽可能加以警惕。同时，意大利政府也作出表示，同意与其他列强就禁止武器运往中国问题采取一致行动。20日，俄国政府表示完全赞同法国的建议，并指出列强间有必要就此缔结一个协定，对中国禁运武器的期限至少应到本次战争结束。同日，德国政府也作出赞同法国建议的表示，并指出德国还为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24日，中立国瑞士也加入这一行动，瑞士联邦总统表示，瑞士决定与其他列强一道进行调查，并采取适当措施，以禁止武器运往中国。与此同时，各国相继发布禁令，不

<sup>1</sup>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 122 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1980 年 5 月第一版

<sup>2</sup> 转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葛大平，《近代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准武器、弹药或军用物资运往中国<sup>1</sup>。可以说，这是自近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的第一次联合武器禁运，而始作俑者便是法国。

在此期间，对于清政府大沽之战后的求和活动，法国虽然倾向与清朝议和代表李鸿章接触，但亦始终以与各列强保持一致为前提。如针对李鸿章最初提出的不要将大沽之战看作清政府对外开战，希望与列强缔结和约的请求，法国外长在6月21日表示，他将不反对李的和平使命，但须以其他列强也持相同立场为前提，为此，德尔卡赛于同日训令法国驻俄、英、德、奥、美、意大使，了解各驻在国政府对李鸿章使命的态度。7月中旬，在收到清政府请求法国帮助恢复和平的国书后，法国又立即向其他列强通报这一情况，征询意见，并向清政府提出法国出面斡旋的四项先决条件：一、确保各国政府与其驻京公使通讯的完全自由；二、端王及其他对义和团事件负有责任的高级官员在等待惩罚期间应被开除出政府部门；三、命令各地军政部门，停止排外活动；四、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骚乱，并强调“如果不能答应这些条件，那么只能诉诸军事行动。”德尔卡赛还毫不客气地告诉中国驻法公使，“中国政府必须到法国公使馆等候法国总统的答复”<sup>2</sup>。法国的这一态度，实际上与其他列强一样，拒绝了清政府的求和请求。

7月底8月初，在联军准备再次进犯北京前夕，法国外长德尔卡赛再次倡议各国加强联合，统一行动，就联军人数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以免重蹈覆辙。他指出：“在途中或北京城墙下失败对各国公使和外国人将是致命的，而且这必然会在整个中国引起反应，因此，……为了取得完全的成功，各国不但要一致，而且必须同时努力”<sup>3</sup>。在联军统帅问题上，尽管法国极不愿自己的宿敌德国的瓦德西出任统帅，认为如果法国容忍任命德国将军为总司令的话，“可能引起紧急的国内危险”<sup>4</sup>，但为了维持联军的团结，法国最后还是作出让步，于8月14日通知德国政府：“共和国政府对于列强在中国所从事的防卫及保护事业的成功始终非常关心，而且一开始就致力于他们的军事合作，并为此提供一切便利。这就是说，当瓦德西元帅一旦到达中国，并且由于他的军衔最高而在联军各国司令官会议中占有显著地位，法军总司令不会不保证

<sup>1</sup> 转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葛夫平，《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sup>2</sup> 同上注

<sup>3</sup> 同上注

<sup>4</sup>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33页，张荣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4月第一版

他与元帅的关系”<sup>1</sup>。尽管这一答复是非常勉强和含糊的，但它说明法国为在镇压义和团上维护列强间的团结，最后还是捐弃了普法战败之仇，将维护列强的团结置于对华政策的最优先地位。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过程中，法国积极地参与了军事行动，但这不是主要的，这点由联军的侵华人数也可看出。据1900年7月6日的《泰晤士报》载，八国联军登陆人数（7月初）：

国别	军官人数	士兵人数
德国	44	1300
英国	184	1706
奥地利	12	127
美国	20	329
法国	17	387
意大利	7	131
日本	119	3709
俄国	117	5817
总计	520	13506 <sup>2</sup>

法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外交方面，就是积极地协调其它列强间的关系，加强它们间的联合，促使它们的“共同侵华”这一目标得以顺利实施，从这一点上，法国所起的作用也是相当大的。

### 3.2.2 法国侵略军的罪恶活动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过程中，法国侵略军与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京津蒙难记》中记载，“法国兵屠杀义和团最多，曾有一队法国兵碰到一群中国人，其中有义和团，有清兵，也有平民，他们把这些人赶到一个死胡同，用枪射杀，一个也未幸免”<sup>3</sup>，《义和团史料》中也有记载，“各国将士利宫廷所有，争欲先入。美军攻宫未下，法军又自城上架巨炮攻之，伤及美军不顾；余军亦各自为战。……法殖民地步军有言曰，即无赏，又不得纵掠，何故驱我等犯炎暑远来耶？”<sup>4</sup>“北通州自联军攻破后，

<sup>1</sup> 转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葛天平，《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sup>2</sup> 转引《沙俄是八国联军的侵华元凶》，魏宏远，上黎，《南开学报》1980年第4期

<sup>3</sup> 《京津蒙难记》第37、38页，北京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sup>4</sup> 《义和团史料》（上下册）第8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和编 中

俄法二国之兵一切行为，大干军律；凡有妇孺多遭杀戮”<sup>1</sup>，这充分刻划了侵略者丑恶的嘴脸。《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则说，“自洋兵入城，不独新到之兵，各处抢掠，即各使馆旧人，除公使外，所有洋官以及一切人等，无不乘机出掠，大满其欲。即西报及西人，均言此次乱事，我西人或因劫掠以致富矣”，“礼王府银库存现银200余万两，悉被法兵劫存西什库，堆积如山，至宝器各物，亦充栋盈屋，用大车拉至7日而毕”。<sup>2</sup>《八国联军在天津》也记载着，“由于火势蔓延，到处混乱以极，于是中国人以及联军军队便乘机抢劫天津城。……法军、俄军和日军也以一种笨拙的方式跟着去抢劫了”，“在北京有抢劫的事吗？有。……这种罪恶是有传染性的。一些外国军队显然是没有限制地进行抢劫”，“在联军中派遣所谓‘惩罚性的征讨队’到乡间去已逐渐成为经常的事了。那些派遣征讨队的人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理由是对野蛮与半开化的人只有杀一儆百”，“天津城池已经陷落，跟着而来的抢劫！何等惊人的景象！城门刚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美军、俄军、英军、日军和法军到处乱跑，闯进每一户人家，要是门不是开着的，就马上一脚踢开。……他们喜欢什么就可以随意拿走”，“……这些可怜的中国人就落到日本人和法国人的刺刀下。因为法国人和日本人不知道这种劝告，立即开始了烧、杀。……到处都在抢掠”<sup>3</sup>。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中这样描述，“在天津华界方面，法国驻有一个大队于此，几乎每天皆有杀人及暴行之事发生”<sup>4</sup>，北京城陷时，“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麇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井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sup>5</sup>。以上仅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史籍的记载，对侵略者的罪行，在外国人的著作中也有描述。美国史家马士也描述到，“……外国军队也跟着进行抢劫。银元宝是他们主要的目的物，找到的以吨计——他们据为己有了；……有些俄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军队则是拦路抢劫更为出色”，“外国军队现在却着手对它洗劫了，

---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5 月第一版

<sup>1</sup> 同上注第 179 页

<sup>2</sup>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上辑）第 26、27 页，北大历史系编，中华书局 1964 年第一版

<sup>3</sup> 《八国联军在天津》第 94、147、149、201、397 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齐鲁书社 1980 年第一版

<sup>4</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三册）第 119 页，翦伯赞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第一版

<sup>5</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 358 页，翦伯赞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第一版

---

虽然是暴乱地，却是有步骤地在干。最初，他们散布到城内各处，随心所欲，不管地区。其后，每个分队在指定由它来维持治安的地区进行抢劫，“法国兵作有计划的和彻底的掠夺”<sup>1</sup>。俄国史家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也有记载，“我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在奉天也住了一个月，在北京，军官和指挥官太多了，风纪败坏的外国兵也太多了，所以在那里既没有什么秩序，也难取得一致。一致的倒是抢劫”<sup>2</sup>，美国人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也有描述，“联军将一个个村庄付之一炬，在身后留下一堆堆废墟。进入京城后，所有人都参加了抢劫，各国的军人和传教士都参与了，欧洲人最坏。”<sup>3</sup>

上述史实充分地刻画出法国侵略军的丑恶嘴脸，他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 3.2.3 法国教会的罪恶活动

随着八国联军侵华的深入，那些获得解救的传教士和教民们，平时劝戒人们“不可偷盗”的福音传播者们，怀着复仇的愤火，参与了联军的军事行动。于是，曾经以“劝人为善”为职志，高唱“哈利路亚”的人们，变成了迷失人性的抢劫者<sup>4</sup>，他们配合联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罪行，其所作所为构成了西方传教史上最不光彩的历史画面。在侵华战争的过程中，法国传教士们积极的参与军事行动，他们不仅在使馆和教堂构筑工事，持枪抵抗，而且还在北京和外界的联军及联军各队间联系断绝的情况下，越出高墙，穿梭往来，传递情报和信息，他们还充当侵略军的向导、翻译和情报官等。在《京津蒙难记》中这样描述，“公使团把中国教徒中的青壮年也都组织起来，参加防御工作。……由外国传教士率领……外国传教士驱使中国教徒和洋兵一起参加战斗”<sup>5</sup>。在准备向北京进军时，联军搜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侵略军的向导、翻译和情报官等，这批传教士成为了八国联军中新来的“军官”。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福里在给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的信中透露，“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他们离开自己的传教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

<sup>1</sup>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 262、302、303 页，（美）马士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第一版

<sup>2</sup> 《八国联军目击记》第 1 页，（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第一版

<sup>3</sup>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 357 页，（美）周锡瑞著、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一版

<sup>4</sup>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 318 页 顾卫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sup>5</sup> 《京津蒙难记》第 19 页，北京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



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而樊国樑给巴黎遣使总会白登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这是为了提供军队将领们所需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法国将军们的感谢和志意。在此我还要向你们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sup>1</sup>。从以上可知，这些所谓的“传播基督福音”的传教士已撕去伪装，成为八国侵略军的一部分，直接参与了武装侵略的行列。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大肆浩劫，城陷不久，各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特许士兵抢劫三日（即自8月16日起至18日止），实际上，抢劫活动早从占领北京的第一日即8月14日就已经开始。这时，曾经充当联军情报人员和秘探的传教士和教民们，又和联军一起参加了骇人听闻的抢劫。有一位目击天主教司铎和教民抢劫的西方人在其信中这样写到，“水手司铎、和他们的信徒，想信天助自助的人，急忙设法收扩财物，尽量赔补自己所受的损失。事实上，在那里（北堂）我所能见到的人只有教友；他们尽量把银两堆藏在一间偏僻的屋子里。这些都是因着神圣的权利而抢来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天主堂的所有物。当时，这是一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sup>2</sup>。这位西方人士所目击的北堂的教牧人员和信徒的抢劫是由北堂主教樊国樑指挥的，这位主教大人在下令抢劫以前，亲自请示了法国公使，在获得准允后公然出“布告”命令教徒四出抢劫。“布告”称：“我在北堂，曾获得法国公使的批准，得以为你们这些丧失一切的难民准备吃、穿、烧等日用必需品。……为了使众信徒免于冻饿而死，一切抢来之物都应归公，堆放在一处，然后大家均分，为此，我颁布以下命令：一、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后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折合一百七十五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须；二、每户或每人在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如超过五十两银子的，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多余之物归公”<sup>3</sup>。在庚子事变以后的二十余年，来中国巡视教务并驻节北堂的教廷宗座代表刚恒毅（1876—1958），在获知樊国樑和北京教区的所作所为后，曾非常感慨，他这样写到，“在镇压拳民的时候，北京全城听由外国军队任意处置，拳民和他们的友人被杀了，他们的家被抢了，樊国樑主教乘机让人携抢银两和在一

<sup>1</sup>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201 页，顾长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4 月第一版

<sup>2</sup>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 339 页，顾世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sup>3</sup> 同上注 1 第 206 页

个拳民的友人亲王府里的艺术品，并接受了法国士兵给他送来的银两。赵怀义主教和程有猷主教，当时还是小修院的修生，他们对我说，他们也参加了那次掳夺的行动。”<sup>1</sup>后来，参与跟随樊国樑抢劫的神父和修女都作证说，“樊国樑劫了礼王府，又到庆王府拉了若干车银子和财物，还从李莲英宅内拉了许多古书、花盆、玉器等，以致他所居住的北堂院内诸物堆积如山。”<sup>2</sup>1900年12月14日，法国《北方醒报》登载了一位曾参与抢劫焚掳的某回国士兵的陈述，从而证明了上帝仇恨的魔鬼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那些“虔诚”的福音传播者们。这个士兵说，“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道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们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铺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sup>3</sup>对此，1901年1月9日的《纽约先驱报》登载樊国樑在曾支持义和团的户部尚书立山家行抢，劫去财物珠宝约值100万两白银。<sup>4</sup>中国史料也证实了这一事实，《庚辛纪事》中明确记载着，抢去“其家（立山）古玩值300万，……联军入京，家资尽丧，凡诸宝器，大半西去。”<sup>5</sup>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皇宫、王府以至店铺、民宅皆被洗劫一空。兵士们拿了金银珠宝这些东西，在北京城内乱跑，由于连日混乱，没有一家银行敢于开张营业。法国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樑看中了这个时机，于是私发支票，收买联军贼赃从中渔利。有一个回国的士兵回忆说，“我们抢来银锭，教士们向我们收买，给付我们向马赛‘马尔古行’取款的支票和向巴黎一个教会取款的支票，我记得是遣使会，无论如何，是在巴黎薛甫尔街的一个教会。支票大部分是葛神父签字的。”<sup>6</sup>樊国樑用支票收买金银珠宝，于是北堂立即变成了熙熙攘攘的交易所，院里除去抢来的物资外，又增添了一批用支票收买的金银珠宝，北京教区会计葛珑璧在三天就发出了四十五万法郎的记名和不记名的支票。樊国樑是作了一项大好生意，却给巴黎遣使会总院招来了麻烦。每天都有许多归国的官兵拿着葛珑璧签过字的支票来兑款，更糟的是法国社会上突然产生了一种舆论，说是遣使会士樊国樑利用联军洗劫这个京城时

<sup>1</sup>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340页，顾卫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sup>2</sup> 《教案与近代中国》第295页，冯祖贻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sup>3</sup> 《庚子年间天主教北京主教法国人樊国樑》，邵循正，《大公报》1951年8月17日

<sup>4</sup> 转引《樊国樑在八国联军侵略时的罪行》，赵永生，《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

<sup>5</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316页，翦伯赞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sup>6</sup> 同上注3

机，私设银行，发行支票，收买金银珠宝，所赚得的油水简直无法估计。而樊国樑一再强调，他根本没有私设银行从中牟利的打算，而是见到联军所抢获的财物无法携带，被中国人收买又容易受骗，由此才想出了这条妙计，给本国的士兵尽一份“义务”。<sup>1</sup>

传教士们的抢劫并没有熄灭他们复仇的气焰。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教堂后，立即召集教堂武装，每天都要开设临时公堂，对非教百姓逼供、拷打，稍有反抗即诬以私通“团匪”，致其死地，百姓若要保全身家性命，就要偿付“精神赔偿”，否则格杀勿论。1901年8月6日，樊国樑在给天主教巴黎遣使会总部的信中写道，“为被杀害的传教士，总督交给我一笔巨款，我未加商议而予以全部拒绝。我说：‘传教士的生命绝非金钱价值所可比拟，法国公使会为这些人命索取精神赔偿的’”。<sup>2</sup>这些传教士以“精神赔偿”为借口，除了要银子外，还发出了“用人头抵人头”的血淋淋的叫嚣，“仁慈上帝”的孩子，们一瞬间成为了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如，河北省任邱县曾有680名教徒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在1901年的复仇中，欧洲的天主教士要求赔款七十万串现款（折合34万两白银）和680个人头。<sup>3</sup>而当时“赫赫有名”的法国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樑，也由于此间在华做了“特殊”贡献，得到梵蒂冈的最高荣誉头衔——“宗座卫士”的称号。

这就是虔诚的传播上帝福音者的勾当。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过程中，这些念念不忘伊甸园偷吃果子是罪恶，要世代赎罪的传教士们，他们的行为早已不是像当年亚当和夏娃那样受魔鬼勾引的，他们自身就是魔鬼，早该坠入十八层地狱中了，其所作所为也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sup>1</sup>转引《樊国樑在八国联军侵略时的罪行》，赵永生，《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

<sup>2</sup>《教案与近代中国》第297页，冯祖贻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sup>3</sup>《中国教案史》第599、600页，张力、刘鉴唐著，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 第 4 章 法国与《辛丑条约》的签订

### 4.1 法国的意图

随着八国联军侵华的深入,8月4日,各国联军约2万人,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次日,北仓失陷。6日,英、俄、美军进攻杨村,清军迎战失利,裕禄自尽。清政府宣战后一个星期,就指示驻外各使馆向各国政府保证,由它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并命令荣禄派人到外国使馆商议停战,后来又一再向俄、日、英、法、德、美政府乞求它们出面调停。8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光绪帝于次日清晨仓皇出逃。16日围攻西什库教堂的战斗结束。慈禧在流亡途中,颁布“剿匪”谕旨,通令各路官兵剿办义和团,要做到斩尽杀绝。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运动趋于低潮,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这场农民运动,斗争矛头非常清楚,他们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直指帝国主义,而作为帝国主义前驱的教会又首当其冲。据不完全统计,天主教传教士遇难者约四十四人,教徒一万八千人;教民被杀的数字很难统计,一说一千九百一十二人,另一种估计为五千人。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事业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传教士们承认“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传教领域的工作瘫痪了,许多传教据点被抛弃了,传教士们纷纷逃往口岸城市以及朝鲜和日本。”<sup>1</sup>因为法国拥有“保教”权,所以格外成为斗争的焦点。“租界将被彻底摧毁,片瓦不留,土地要松土翻耕,要在欧洲人的白骨堆上种上高粱。首先要被摧毁的是法租界,因为这里住着义和团所仇恨的天主教传教士,有天主教修道院,法国军医院、学校和法国领事馆……”<sup>2</sup>“由于中国人对天主教徒、法国人及其传教士怀有宿怨,所以炮火射击主要是对准法租界、法国领事馆、法国工部局的高耸大厦和修道院及医院的建筑物。”<sup>3</sup>所以,这场运动对法国的打击尤为惨重。

清政府战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不得不求和。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它的意图是积极地维护自己的侵略权益。法国与其他列强的利益既有共同的,又有相矛盾的,因此,法国要考虑怎样最大限度地维护

<sup>1</sup>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 342 页,顾卫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sup>2</sup> 《八国联军日日记》第 34 页,(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第一版

<sup>3</sup> 同上注 2 第 128 页

其侵略利益。尤其是法国教会在侵华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受的打击也最惨重，因此，法国又要考虑怎样为教会撑腰，为教会的损失索取最大的赔偿。

## 4.2 “北京撤军”和“和议问题”

### 4.2.1 “撤军”问题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尽管清政府已先后任命李鸿章和奕劻为议和全权大臣，但帝国主义列强不但不立即与清政府开始议和，反而千方百计地拖延谈判。在各国的最高当局还没有就议和的若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之前，各国的军人们依旧按照自己的意志在继续着战争。从9月初开始，联军打着讨伐和清剿义和团的旗号开始对京郊和直隶各地进行扫荡。《义和团史料》中记载，“李鸿章既入京，强与诸酋乞和。各国虽漫应之，依旧遣兵四出滋扰。直隶通省无所不到。……时和议久无成，德、法、俄等国尤横。”<sup>1</sup>在《荣禄存札》中也有描述，“窃维洋人四出霸占，畿辅地方，三分已失其二。夷迹之不敢直进者，只余山岭之处”，“迭据探报，法兵先于闰8月19日抵保定……”<sup>2</sup>。对此，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也有反映，“法兵忽到五虎岭，欲进广昌，并称系直隶地方，已划归法国。”<sup>3</sup>由此可见，在这种形势下，法国与其他列强一样，迟迟不与清政府议和，反而四下出兵，逼迫清政府，图谋获取最大的侵略权益。

列强中最先答应议和的是俄国，俄国是想要东三省，俄国在这儿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要解决1896年中俄密约所没有能够解决的东三省的国境问题。俄国准备率先同中国议和的消息披露后，过去潜伏在各国之间的复杂矛盾又重新暴露了出来。一番协调后，各国最终确定了先议和后停战的策略，而不是清政府希望的先停战后议和的办法。同意议和的大前提确定后，各国开始围绕自己的国家利益，在下述两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是关于是否撤退驻京使馆和占领军问题；二是关于是否承认李鸿章的议和全权

<sup>1</sup> 《义和团史料》（上下册）第 227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5 月第一版

<sup>2</sup> 《荣禄存札》第 39、40 页，杜春和等编，齐鲁书社 1986 年 12 月第一版

<sup>3</sup>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 911 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大臣的资格问题。8月25日，俄国外交部训令驻外使节通知各该国政府说：由于清政府已经撤离北京，俄国政府“拟将其公使四等文官格尔思及所有使馆人员召至天津；俄国军队将伴送他们到上述地点。”<sup>1</sup>俄国显然是表示支持清政府早日返回北京恢复其统治，借此博得清政府的好感，以便实现它长期控制东北的野心。对此，几乎遭到列强的一致反对，英国政府对俄国的通知作了拒绝的答复，德、意、奥等国均反对自北京撤军的建议，日本则声明说，“由于日本靠近华北，如果需要再度派遣部队，对它说来将是比较容易的；因此，日本政府对他们采取的措施不会引起不良结果一事感到放心。”<sup>2</sup>对法国来说，由于它是俄国的盟国，不得不表示支持。“坚决支持俄国公使和将军的协商，偕同使馆人员和法国军队以及那些可能希望伴随他们的中国基督教徒，尽快地离开北京。”<sup>3</sup>由于当时没有一个政府表示无条件地接受俄国的意见，所以，俄国被迫放弃原意，在北京参加列强关于议和的预备谈判。

由此可知，法国在“撤军”问题上，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仍然非常注意其盟友俄国的意图，并且积极地配合盟国，在此基础上攫取更多的侵略利益。

#### 4.2.2 “和议”问题

清政府企图依靠当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出面办理对外交涉，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李鸿章到达上海，但他却突然停下不走了。有两个因素促使李鸿章留在了上海，一个是他担心慈禧的态度出现反复，再一个就是他向各国的和谈请求还没有任何回音。8月19日，在逃出北京后的第五天，慈禧发出了两道上谕，第一道发给了军机大臣荣禄和大学士徐桐与户部尚书崇绮，明令他们留在北京向洋人求和，但在城破不久，荣禄已经跑到了保定，而那两位大臣也相继上吊身亡了。她的第二道上谕发给了身在上海的李鸿章，要求他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议和。一番协调后，各国最终确定了先议和后停战的策略，

<sup>1</sup>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 239 页，张荣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 4 月第一版

<sup>2</sup>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 307 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1980 年 5 月第一版

<sup>3</sup> 同上注 2 第 213 页

而不是清政府希望的先停战后议和的办法。同意议和的大前提确定后,各国开始围绕自己的国家利益,首先在如何对战败国的前途进行安排的问题上展开了新的较量。各国围绕是否接受李鸿章为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的问题再次争论。在得知列强对自己的议和全权大臣的身份产生争议后,身在上海的李鸿章给慈禧发去了一封电报,要求朝廷添派奕劻、荣禄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此举显然是想借助朝廷对上述大臣的任命,来平衡列强对自己的争议。后慈禧授予奕劻“便宜行事”的全权,添派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但即便如此,除了俄国和美国明确表示愿接受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外,其他的国家依旧没有表态。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李鸿章疏通外交渠道的工作有了进展,议和之事中关于列强是否承认李鸿章为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的问题有了突破。9月底,英国政府承认了清政府提出的议和人选。继英国之后,法国也对议和人选的问题表示了赞同。在英、法、美、俄都已经答应由奕劻、李鸿章来担任中方的议和的选后,其他国家也先后表示了认同。这样一来,在战争正式爆发了近4个月后,战胜国与战败国准备开始和谈了。

在与俄国磋商后,9月30日法国外长德尔卡赛把法国为列强拟订的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的6项条件通知法国驻英、德、奥、意、日、美等国大使:一、严惩祸首;二、继续禁止军火入口;三、赔偿损失;四、使馆驻兵;五、拆除大沽炮台;六、联军占领大沽至天津之间的二、三处地方,以保持北京至沿海的联系畅通无阻。10月4日,法国将上述6项谈判条件同时知照各国政府,指出,列强解救使馆的目的已经达到,“目前的任务是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对过去的适当赔偿和对将来的确实保证”<sup>1</sup>,“这些条件若由各国使节联合提出,并得到各国驻华军队的支持,象这样的合理条件,会不被中国政府所立即接受那是不可能的”。<sup>2</sup>为了促使各有关列强尽早与清政府进行谈判,10月14日,法国又提出一个新的照会,声明在法国建议的基础上,“某些政府的保留意见,可以在列强之间或他们的驻京公使之间在谈判期间进行商讨,为了尽快达到共同目的,对这些条件可以作些必要的修改”。在照会中,法国再次强调列强在对华态度上应保持一致,指出“目前重要的是,向已宣称准备谈判的中国政府表明列强之间的意见是统一的”<sup>3</sup>。后两位议和大臣联合照会各国,提出了5条议和纲领:1. 承认围攻使馆违反国际公法,保证今后不再

<sup>1</sup> 转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葛大平,《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sup>2</sup>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356页,(美)马士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sup>3</sup> 转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葛大平,《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出现类似事件；2. 愿意协商赔款问题；3. 同意修改有关条约，侧重中外商务；4. 收回被占衙署，与各国分别缔约；5. 先行停战。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开出自己的谈判条件，算是对之前各国原则上都同意的那6条谈判基础的回应。对照一下双方的谈判条件后就会发现，中方提出的条件离列强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联军的最高统帅瓦德西赶到北京，他鼓动各国，坚决拒绝中方先停战后议和的要求，并且各国还一致提出，只有清政府如何在如何惩办祸首等问题上有明确的表态后，才可能开始考虑议和的问题。这时，联军又在军事方面威逼清政府，“1900年12月14日，德法两国因朝廷不将祸首严惩，经华得西大将军调齐各营队伍，听候号令西发，大势岌岌将决裂”，“1900年12月21日—26日，自京往保定火车，不卖客票，……载德法马步炮队兵。……德自保定而西，法自正定而西，相机前进，盖其意欲向山西进发也”<sup>1</sup>，迫使其就范。

从1900年10月到年年底，列强围绕谈判内容，争执不休，直到12月24日才统一了意见，在法国提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大为议和大纲十二条，大纲内容主要为：一、以最重要的律法将“祸首”治罪。二、向各国分别赔款。三、派大员赴德、日谢罪，为克林德建碑。四、滋事各地罚停科举5年。五、炸毁大沽口炮台。六、天津至北京沿途设洋兵卡。七、各国使馆准永远屯扎卫队。八、此后对仇害洋人负有罪责的大小官员，应永远开除不用。九、禁止向中国运入与战争有关材料。十、治罪谕旨和告示应张贴两年，解散所有团匪坛会。十一、更改各公使观见礼节，总理衙门只设主管大臣1名，以示重视。十二、条件全部照允照办后，联军才撤兵。议和大纲不追究慈禧太后的责任，不逼其归政，全赖李鸿章极力斡旋。慈禧心头大石落地，复电指示：“敬念宗朝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2条一概应允，并颁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政策。

由上述可以看出，在“议和”问题上，法国是非常活跃的，他不但积极地提出自己的纲要，并且与其它列强积极地协调、沟通，最大限度地攫取最大的侵略利益。

<sup>1</sup>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上辑）第39、42页，北大历史系编，中华书局1964年第一版



## 4.3 “瓜分问题”和“惩凶问题”

### 4.3.1 “瓜分”问题

帝国主义列强在出兵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都企图乘机掠夺中国领土，巩固和扩大在华的势力范围。1900年夏季和秋季，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在庚子事变前后，西方势力中曾经一度出现过“瓜分”中国的舆论，但不久即沉寂下去。这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在瓜分中国以后无法均衡地分配其各自在华的利益。七月下旬，在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的同时，英国开始暗中策划占领上海。后英国通知上海领事团说，英国部队将于8月12日到达上海。而领事团分别致电他们各本国政府，建议上海不应由英军独自占领，而应有联军采取共同行动。18日，英军二千人在上海登陆，接着，法、德、日等国军队也先后在上海登陆。英国独占上海的计划受到破坏，各国之间出现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sup>1</sup>当列强纷纷调兵遣将，企图将它们在华的势力范围变成殖民地时，美国忧心忡忡，于是向列强发出照会，重申1899年的“门户开放”政策。

另一方面，则是在庚子事变中义和团以其特有的形式表现出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活力。法国议会在辩论此后对华政策时，一个议员经过对中国社会情况及民族特点的具体分析后指出，“各国以其民气未开，不肯自求进步；又因北清之乱，遂群起而思侮之，夺之，驱勒其人民，瓜分其土地，以为等诸印度，南洋诸种类。噫！此所谓智蔽于欲，不思甚矣。若然，吾但见其徒事流血于亚洲大陆，反一无所成而已”，“中国地广人稠，民气坚劲，殊非印度、南洋各处可比”，“且华人久沐孔教，同德同文，与西人性情每生反对，若领其地分治其民，将必移易其风俗，伤碍其宗教，近如电线铁路等等，以华官而效西法，人尚嚣然抗拒，况他族居然临御其上，岂无伟人攘臂合群，以死命相拼乎？……今华人正当激甚之时，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已宣布于通国，若从而拨动之，谁敢谓亚洲堂堂之大国，无华盛顿其人…起。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sup>2</sup>由此可见，正是义和团运动给予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它使法国侵略者认识到，瓜分中国是下策，这一图谋也难以实现。法国于是协调其它列强，不得不改变侵华政策，放弃瓜分企图，改以

<sup>1</sup> 转引自《义和团运动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矛盾和斗争》，胡滨，《山东师院学报》80年第5期

<sup>2</sup> 《近代中外关系史》第157页，刘培华著，北京人学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以华治华”。

#### 4.3.2 “惩凶”问题

谈判正式开始后,法国又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积极协调各国立场。当时,列强间争论最激烈的是惩凶问题。英、德两国主张严厉惩办清政府中的排外官员,俄、日、美等国则倾向从轻处理,并主张缩减罪犯名单。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政府开始时与英、德两国立场一致,也主张严惩。9月17日,当德国提出“把交出及惩办祸首”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时,德尔卡赛即向德国驻法大使表示,尽管他没有时间征求部长会议的意见,但法国早在7月19日就已向中国提出惩办端王等人的要求。换言之,法国不会反对德国的建议。9月21日,德尔卡赛便以法国政府的名义,正式宣布接受德国的提议<sup>1</sup>。10月2日,德国对清政府9月25日颁布的对载漪等九人革职并交有关衙门议处的上谕不满足,再次提出关于“惩凶”问题的三点新建议,主张扩大罪犯名单,加重处罚,实行死刑,并对惩罚的执行实行监督。对此,法国也持支持态度。10月7日,德尔卡赛电示法国驻柏林代办,命令他将法国的这一态度通知德国。次日,他又训令驻华公使毕盛与其他各国公使一致行动,“俾使德国建议有实际结果”<sup>2</sup>。但到11月就议和大纲中是否对外交团开列的祸首名单向清政府提出“死刑”的要求,以及是否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的问题上,法国改变了以前的严厉态度。为促使议和大纲早日形成,法国对英、德和俄、美、日的态度予以折中,于11月25日向各国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我们可以坚持把惩凶本身作为绝对的,不容争议的要求,其中必须惩罚各国驻京代表会议认定的全部高级官员;另一方面,我们不必将这些惩罚的性质和执行作为先决条件或使用最后通牒的形式,而是警告中国政府将它作为和谈的第一个问题”<sup>3</sup>。法国的这一建议推动了列强间就此问题达成妥协,议和大纲的最后措词即采纳了法国这一建议的精神。

最后,在是否要求对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和董福祥处以死刑的问题上,法国的态度也起了关键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英、德、意、奥四国坚持死刑要求,俄、日、美三国则坚决反对。1901年2月5日在外交团讨论惩凶问题的会议上,法国公使毕盛再次出面协调各国立场,声称他已收到本国政府训

<sup>1</sup>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 127 页,孙瑞芹译,商务印书馆 1960 年 8 月第一版

<sup>2</sup> 转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葛天平,《近代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sup>3</sup> 同上注 2

令，不再继续要求对载漪和载澜处以死刑，建议列强谋求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由于法国态度的转变，英、德只好作出让步，最后各国公使达成一致意见，要求清政府对端王和载澜判为斩监侯，遣往新疆，永远监禁，不得减免。至此，在法国的协调下，列强关于惩凶问题的争论宣告解决。

#### 4.4 赔款问题

在和谈过程中，列强间争论激烈的另一个问题是赔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与俄、德一道主张从清政府那里勒索尽可能多的赔款。早在1900年12月27日，法国外长就要求驻华公使毕盛将法国国家、团体、及个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所受损失的大约数额尽早告知，以便政府确定赔款数目。在如何确立赔款数额问题上，法国反对组织一委员会确定各国国家、团体、及个人的赔款数额，主张由每个国家自己确定其赔款数目以及属于它的团体和个人的赔款数额，然后形成一个赔款总数，如果总数超出中国的偿付能力，再对各国要求的赔款数目按比例削减；指出若由一委员会来确定各国赔款数目，会给问题的解决带来复杂性及不必要的拖延。法国的这一主张被大多数列强所接受，3月中旬，列强确定的赔款原则即吸收了法国的意见。结果，法国公使提出该国赔偿要求的正式数字，计算到7月1日为止是286,500,000法郎（约75,779,250海关两），容许削减6,000,000法郎。从7月1日以后，他的政府每月要求赔偿军费6至7百万法郎<sup>1</sup>，后按比例削减，确定为70,878,240海关两。法国的这一赔款占庚子赔款总数的15.75072%，在列强中居于第三位，仅次于俄、德两国。

在有关赔款的偿付方式问题上，法国也从自身利益出发，为尽快获得可观的赔款，与俄国一致，主张由列强联合担保的借款来支付赔款，且一次付清，认为这是“解决赔款问题最好和最快的办法”<sup>2</sup>。但在这一建议遭英、美的坚决反对后，法国为避免因此问题使在华列强分裂，最后放弃原来的主张，接受英、美等国提出的用发行债券的方式来支付赔款的建议。6月11日，法国外长德尔卡赛在与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磋商后，训令新任驻华公使鲍渥接受列强代表一致同意的偿付方式，无论是借款还是债券，“以使列强重新

<sup>1</sup> 《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第204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齐鲁书社1984年1月第一版

<sup>2</sup> 转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葛人平，《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一致”，并命令驻华公使将注意力转到债权的担保上<sup>1</sup>。

在关于债权的担保品或者说赔款的财源问题上，法国由于对华贸易比重不大，与俄国一样，主张将提高海关关税作为赔款的财源，认为海关关税是最保险、最便利的担保品；提高海关关税，“对中国国内和国际贸易都不会造成损失”，如果海关关税还不够，可以常关税和盐税作为补充财源。对于英、美等国提出以取消厘金作为提高关税的条件，法国持谨慎态度，认为取消厘金有一定难度，指出“若从中国角度看，不应忘记，在中国负责公共设施的地方当局，是从厘金收入中获得所需费用的，因此，重要的是在取消厘金的情况下，代替的税能给他们带来双重利益，既不会被中央政府所独揽，也不会用作借款的担保”<sup>2</sup>。然而，尽管法国在赔款的财源问题上与英、美等国存在一些分歧，但在自身利益未遭损害的情况下，法国最后还是与俄国一道从维护列强的一致出发向英、美让步，不坚持将海关税增至值百抽五以上作为预备担保，也不反对英、美等国提出的将海关税值百抽五与取消厘金等财政改革挂钩的要求。

在赔款问题上，樊国樑与法国公使毕盛勾结起来，使原来草拟的条约内容几番更改，借以讹诈更大的赔款。在讨论赔款问题的会议上，毕盛横生枝节，照会清政府，“此次拳匪倡乱，京内教会教堂、养病院、育婴堂以及学堂坟地，均被焚毁。请派大员会同驻京主教，议定赔款办法，早为清理。”<sup>3</sup>随后，早已沆瀣一气的各国公使也相继提出同样的要求。而被洋人吓破了胆的清政府本着各国一体办理的原则，只得照会各教派主教等，共同协商此事。经过两个月的“详细考核”，以及“与各国教士往复商议”，结果京城内仅赔偿法、美、英三国教堂损失银即达248万多两；赔偿被毁坟地银7万两；赔偿各教堂教民的抚恤银143万两。<sup>4</sup>传教士利用复仇和条约进行讹诈和勒索的项目还很多。除了条约所规定的赔款（时称“大赔款”）外，还强迫地方官员应由地方自筹款以赔偿教堂、教民之“损失”，称为“地方赔款”。地方赔款的数额之大，一般都超过地方年财政收入。在1901—1902年，北京与直隶省自筹款项达1112.4万两<sup>5</sup>，山西220万余两，山东80万两，四川80万两，湖南30万两，浙江20万两<sup>6</sup>，其他赔款总数较高的省份尚有奉天290万两，江西30万两，吉林22万两，河

<sup>1</sup> 转引《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葛人平，《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sup>2</sup> 同上注1

<sup>3</sup> 转引自《樊国樑在八国联军侵略时的罪行》，赵永生，《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95页

<sup>4</sup> 《教案与近代中国》第300页，冯祖貽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sup>5</sup>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10页，顾长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一版

<sup>6</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40页，葛伯赞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南19万两，内蒙西部70.2万两<sup>1</sup>。正如《荣禄存札》中所记载的，“即如教案赔偿一事，关系本属匪轻……当时正值各国公使颇以去岁之变多因教事而起者，而各教主、牧师遂欲令民间各自赔偿，无须各公使参予其事……于是各主教等遂亦易辙改弦，更订办法。以致都中牧师，教民久占各处府第、民居，京外村镇极意勒派，而不肖教民，又复勾结洋兵肆其淫掠讹索，鱼肉乡里……，今岁内地抚议初订，各处教堂趁势索款，要求无厌。承德各属教民间有受害之处，视口内本极轻，该主教等覬覦生心，因缘为利，竟需索16万有奇。”<sup>2</sup>

---

<sup>1</sup> 《中国教案史》第 611 页，张力，刘蓉庸著，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sup>2</sup> 《荣禄存札》第 54、66 页，札存和等编，齐鲁书社 1986 年 12 月版

---

## 结 语

综合上述，不难看出，到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了飞速地发展，于是法国更加积极地对外侵略扩张。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落后的封建社会末期，清政府统治腐朽，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法国侵略的对象。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法国的实力逊于英国，因此法国以宗教、文化侵略为主要手段。这与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产生了矛盾，导致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并发展成为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沉重打击了法国在华的教会势力，法国怂恿列强，共同侵华，致使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运动失败，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反抗斗争却粉碎了法国及其他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法国和其他列强不得不改变侵华政策，扶植反动政府，“以华治华”。在战后问题的处置上，法国又积极地配合其盟国—俄国，与其他列强既联合又斗争，最大限度地攫取更多的侵华利益。所以说，法国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侵华的罪魁祸首，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元凶。

## 致 谢

我在做这一问题的研究时，深感困苦：资料极端匮乏。虽然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资料很多，但与法国有关的很少，且散见于其他资料中。特别是与法国外交有关的档案资料，没有翻译过来，加之自己的水平所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定很是粗糙，错误也在所难免，希望老师们批评指正，我将深感荣幸，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我在学术道路上刚刚起步，这要归功于我的导师鲜于浩先生。先生不但给予了我精深的指导，如查阅资料，选题，设计提纲，审稿等，还给予了我极大的资料方面的便利。先生藏书颇丰，好多是别处无法找到的。此外，先生和师母吴老师在生活方面也给予了我极大的关怀和照顾，可以说，没有先生和师母的关爱，也就没有此文的成形，在这里，我衷心地道声谢谢。

其次，我要感谢所有给我上过课的老师，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思维方式都使我受益非浅，既开阔了我的视野，又拓展了写作的思路。我也要感谢资料室的老师们，在学习和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老师们在书籍借阅及资料收集上也对我提供了很多方便。还有其他帮助我的老师们，在此我一并致谢。

此外，我还要感谢李少功、刘晓洲、赵纯清和傅振龙，他们在自顾不暇之余，与我商谈提纲，帮我开拓了思路，此文的完成，与他们的帮助也分不开。我也要感谢室友张杨，虽然不是同一专业，但从他的专业角度也给了我不少启发。还有，其他帮助我的朋友们，在此，我衷心地道声谢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在这三年求学生活中，我的家人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不为生活所累，能安心读书，得以顺利地完成学业。总之，能恰逢这个伟大的时代，承蒙这么多的良师益友的关照，是我之大幸，谢谢他们！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邵兴国. 郑观应农业改良思想刍议. 山东科技信息. 2006.8

---



## 参考文献

### 史料

- [1] 葛伯赞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共四册)[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义和团史料(上下册)[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3]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下册)[C].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下册)[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5] 徐绪典编. 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C]. 济南: 齐鲁书社, 1990
- [6] 路遥编.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C].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
- [7] 杜春和等编. 荣禄存札[C]. 济南: 齐鲁书社, 1986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册)[C].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
- [9] 北大历史系编.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上下辑)[C].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1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清末教案(第四卷)[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1] 田永秀编译. 法国在华经济势力之全貌[C].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 [12] 胡滨译.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3]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C]. 济南: 齐鲁书社, 1984
- [14] 孙瑞芹译.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筹笔偶存[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16] 张荣初译.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C].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 [17] 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C]. 上海: 三联书店, 1982
- [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教务教案档(第一辑)(一)[C].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6年版

### 专著与论文集

- [1] 丁名楠著.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2] 鲜于浩、田永秀著. 近代中法关系史稿[M].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3
- [3] 冯祖貽等编. 教案与近代中国[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 [4] (美) 马士、宓亨利著. 远东国际关系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 
- [5] (美) 马士著.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 [6] (美) 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 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 [7] 陈振江等著.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 [8] (美) 周锡瑞著.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M]. 张俊义、王栋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 [9] (英) 菲利浦·约瑟夫著. 列强对华外交[M]. 胡滨译、立人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10] (俄) 科罗斯托维茨著. 俄国在远东[M]. 李金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5
- [11] 骆承烈编. 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9
- [12] (俄) 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著. 八国联军目击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 [13] 楼宇烈等编. 中外宗教交流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14]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 [15] 胡滨著. 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M]. 上海: 三联书店, 1957
- [16]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八国联军在天津[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
- [17] 李时岳著. 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18] 苏位智 刘天路. 义和团研究一百年[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0
- [19] 于本源. 清王朝的宗教政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20] 吴金钟等编. 近代中国教案新探[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3
- [21] 李育民. 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22] 北京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京津蒙难记[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 [23] 刘培华. 近代中外关系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 [2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5] 张力、刘鉴唐著. 中国教案史[M]. 成都: 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26] 列宁. 列宁全集(第十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7] 列宁. 列宁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8] (美) 费正清著.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2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 [30] 楼宇烈. 中外宗教交流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31] 《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 近代中国史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6
- [32] (法) 史式徽著. 江南传教史(卷一)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 [33] (法) 施阿兰著. 使华记. 袁传璋等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 [34] 王继平主编.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 论文

- [1] 廖一中.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的原因探析[J].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 1982 (1)
- [2] 君朴. 19 世纪后半期几种洋货和土货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J]. 经济研究, 1956 (2)
- [3] 邵循正. 19 世纪帝国主义者在华天主教保护权的争夺[N]. 光明日报, 1957 年 7 月 10 日
- [4] 徐绪典. 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探[J]. 文史哲, 1983 (2)
- [5] (美) 周锡瑞. 传教士、教民与义和团运动——宗教伪装下的帝国主义[J].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 1982 (2)
- [6] 宋文瑾 刘绍刚. 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斗争[J].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 1980 (1)
- [7] 张守常. 梨园屯教案和义和团运动[J].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 1983 (1)
- [8] 廖一中. 论清政府和义和团的关系[J]. 历史研究, 1980 (3)
- [9] 邵循正. 庚子年间天主教北京主教法国人樊国梁[N]. 大公报, 1951 年 8 月 17 日
- [10] 邵循正. 天主教中的两个特别间谍——樊国梁和安治泰[N]. 大公报, 1951 年 9 月 7 日
- [11] 董恩正. 帝国主义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的矛盾与合作[J]. 四川大学学报, 1960 (6)
- [12] 林锋源译. 樊国梁等函牍[J]. 近代史资料, 1964 (32)
- [13] 赵永生. 樊国梁在八国联军侵略时的罪行[J]. 近代史资料, 1963 (3)
- [14] 马光普. 樊国梁的一张布告[J]. 近代史资料, 1963 (3)
- [15] 胡滨. 义和团运动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矛盾和斗争[J]. 山东师院学报, 1980 (5)
- [16] 世博. 八国联军暴行简辑[J]. 历史教学, 1980 (11)
- [17] 魏宏远 王黎. 沙俄是八国联军的侵华元凶[J]. 南开学报, 1980 (4)
- [18] 李德征. 义和团时期帝国主义在联合侵华中的矛盾与斗争[J].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 1980 (1)
- [19] 丁名楠. 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N]. 大公报, 1951 年 9 月 7 日
- [20] 李师洲.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保教权的沿革[J]. 山东大学学报, 1990 (2)
- [21] 葛大平.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J]. 近代史研究, 2000 (2)
- [22] 张雪永. 十九世纪末的中法文化交流述略 (1860—1900) [J]. 天府新论, 2003 (2)
- [23] 刘正详. 晚清时期法国天主教对华传教政策评述[J]. 中国天主教, 2003 (3)
- [24] 任银睦. 清末民初基督教在山东的传播与山东教育文化现代化[J]. 聊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2)

[25] 崔岷. 义和拳冠县起事考[J]. 史学月刊, 2004 (2)

[26] 张芝联. 法国史学家整理法国外交部所藏有关中国和中法关系的档案(1735—1910)  
[J]. 历史研究, 1957 (8)

[27] 王守中. 19 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对山东的侵略[J]. 山东师范学院学报,  
1978 (4)

[28] 公孙匐. 略论义和团运动发源地及赵三多研究的意义[J]. 邢台学院学报, 2005(3)

[29] 雷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法关系研究(1894—1914) [D]. 西南交通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

[30] 刘志义. 论义和团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J]. 东岳论丛, 1994(3)

作者：[邵兴国](#)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 相似文献(1条)

### 1. 学位论文 [张頔](#) 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传教活动研究（1865-1911） 2006

晚清、民国时期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拉丁文名称为CongregationImmaculateCordisMariae, 英文名称为CongregationoftheImmaculateHeartofMary, 缩写为CICM)在中国华北、西北广袤的土地上进行了80多年的传教活动, 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时间最长, 效果也最明显, 且独具特色, 教会拥有土地之广, 教民比例之高, 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之多样, 新旧教发展之悬殊, 教会在地方社会近代化历程中所起的作用, 都是别的地区难以比拟的。深入研究圣母圣心会在华传教活动, 对于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内蒙古地区为边疆、民族地区, 经济、文化发展滞后, 地方文献匮乏, 研究的难度极大。在很长的时间里, 学界对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的传教活动虽有一些研究, 但非常薄弱。

本文对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介绍了晚清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政治、社会形势, 简要回顾了法国遣使会在内蒙古的活动情况。然后按照时间顺序, 对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展开的传教活动, 该修会的传教策略, 传教过程中的蒙、民、教冲突, 庚子年的反洋教运动, 庚子年后的赔教, 该修会的事业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圣母圣心会的传教策略, 蒙、民、教冲突, 庚子年后的赔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国外学者对该修会的传教策略虽有介绍, 但不够全面, 本文对传教策略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学界对庚子年之前内蒙古地区的蒙、民、教冲突的研究较为薄弱, 本文利用较大的篇幅对内蒙古发生的蒙、民、教冲突逐一进行了研究, 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并对狄德满提出的模式进行了完善。学界对庚子年后内蒙古的赔教情况虽有关注, 但不够准确。本文依照当时清政府在内蒙古实施的二元体制对赔教过程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 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此外, 本文还对天主教会与基督教会内蒙古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晚清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整体性的评价: 就传教层面而言, 该修会把天主教深入传播到内蒙古的许多地区,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教会组织, 这是该修会的一大贡献; 该修会在传教过程中进行的各种事业, 是有一定积极意义; 该修会在传教过程中与汉族移民、蒙古王公、蒙古牧民发生的利益冲突, 引发了反洋教运动的风暴, 导致了大量的赔款、赔地, 最终加深了内蒙古地区的半殖民化程度。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36966.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36966.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4beb9b95-0098-4ab5-aa3d-9e4d008e6f91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